

两枚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辨析

郭云艳（北京大学历史系 博士后）

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的发掘既有重要的考古价值，也有着极高的历史意义，这些金币所涉及到的信息涵盖了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外交、国际贸易，以及古代亚洲的政治格局、东西商路沿途局势和风俗地理，乃至古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特征等等多方面问题，是研究者分析理解古代中国与拜占廷帝国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资料。因此，只有正确释读辨析这些金币，才能很好地展开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工作。在各位学者专家的努力下，特别是中文版拜占廷古币目录的专著出版，为了解和认识这些拜占廷金币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然而，严格的说，我国目前对拜占廷古币学的了解还有局限，在释读和辨明个别拜占廷金币的时候，由于资料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疏漏。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两枚拜占廷金币仿制品的形制特征及相关信息加以阐述，以便更为准确地认识这些金币。

截至 2005 年，在我国境内出现的拜占廷货币及金币仿制品大致有 97 枚，其中仿制品为 40 余枚。这些仿制品由于发掘报告中的描述详略不一，资料不尽相同。不过大体上，可以从个别金币的外形特征判断其为仿制品。这些金币严格的说不能称为金币，而是金片。它们总体上为圆形，具有类似拜占廷金币的图案，但该金片极薄，直径与拜占廷金币相当或略大，重量不足 1 克，大大少于金币的标准重量；且多数金币仅有一面图案，形成正背面图案的凹凸现象。因此，这些金片仅从外形即可看出：它们是按照拜占廷金币的样式，将金币的图案打制在薄金片上，来满足制作者的某种需求。这种类型的金币仿制品在我国出现的数量较多，绝大多数薄片金币都属这种类型。

除上述外形为薄金片的仿制品外，还有个别

金币与拜占廷金币的直径、重量差异不大，因此需要从形制上来进行辨别。有个别具有双面图案的金币，形制铭文都比较模糊，难以释读，其制作手法以及图案风格与上述薄金片制拜占廷式金币仿制品极为相似，因此相对容易辨别。然而，根据拜占廷古币目录的说明，可知有些金币无论图案还是铭文都与拜占廷金币真品十分相似，只有专家才能在鉴别大量金币的基础上，通过对发掘地区的其它货币发掘情况的对照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加以辨别。不过根据对拜占廷金币的研究成果，个别金币在形制上的明显差异成为判断其是否为仿制品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当中，也有两枚可以根据其形制判断为仿制品。简单地说，这两枚金币的正背两面的形制分属不同时期发行的金币，从目前已知的货币考古研究看，拜占廷帝国的官方铸币厂并未发行过这种样式的金币。因此可以断定这是一种将不同时期的拜占廷金币式样合在一起铸造的金币仿制品，古币学界称之为“骡子”仿制品。

第一枚可以判断为拜占廷式的“骡子”仿制品的是，1998 年甘肃陇西县城南门外原华光寺遗址发现的瓷瓶中出土的塞奥多西二世 (Theodosius II, 402 ~ 450 年) 金币 (图一)。由于发掘报告所附图片不是很清楚，可以通过报告中的文字描述与照片对照，了解其形制的大致特征。该币正面为皇帝 3/4 正面微向右侧胸像，头戴冠盔，盔顶饰有羽毛，脑后露出冠带；身着束腰外衣和胸甲，右手持矛，矛头从脑后露出；左手持盾，盾上纹饰难以识别。铭文为 DNTHEODO - SIVSPFAVC。背面图案不太清楚，依稀可辨胜利女神侧身向右前行，右手握长柄十字架，背后似有一星。铭文从图片中难以辨认，据报告称 VICTORI - AAVCCC，底部铭文为 CONOB。



图一 1998年甘肃陇西出土之塞奥多西二世金币仿制品
(450年以后)

若仅从铭文和正面形制看，这显然是塞奥多西二世金币。其中正面铭文读作 DN THEODOSIVS PAVC，表示 dominus noster Theodosius pius felix Augustus，意为“我们的主上塞奥多西，虔诚的奥古斯都”。虽然在公元379~395年在位的皇帝也叫塞奥多西（Theodosius I，一般称为塞奥多西大帝），但在其任内，并没有发行过正面图案为3/4正面胸像的金币。这种样式最早出现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337~360年）发行的索里得上^①，但并未广泛采用，一直到塞奥多西一世长子阿卡狄乌斯（Acadius，383~408年）继任统治东部帝国后，才比较频繁地采用这一样式作为索里得的正面图案，并且一直沿用到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8年）统治早期^②。因此，从正面铭文和形制可以判断其为塞奥多西二世时期的金币。

接着再看该币的背面形制与铭文，这是比较典型的“胜利女神+十字架+VICTORIAAVCC”的组合。从目前的古币学研究成果来看，背面采用的胜利女神图案在塞奥多西二世发行的金币中广泛存在。塞奥多西二世的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期间他发行的金币种类也比较多，大体上，正面经常采用3/4正面微向右侧胸像的模式；早期背面样式变化较多，有时是罗马或君士坦丁堡城的拟人化城标，有时是皇帝像，有时为胜利女神侧坐、手捧徽章像^③；一直到420年以后，金币背面才比较固定地使用“胜利女神+十字架”的样式。这种背面样式的主要内容为胜利女神侧身向右前行，手持镶满珠宝的长柄十字架。古币学界将这种样式的启用原因归结为421~422年与萨珊波斯的战争^④，认为皇帝在420年采用这种图案正是为即将到来的波斯战争

祈祷胜利。而镶满珠宝的长柄十字架则是为表示“装饰富丽豪华的十字架”，因为419年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见到基督在天空中显灵，观者身上都出现了十字，为了表达对这一神迹的尊崇，420年，皇帝在耶稣受难地的祭坛上耗巨资树立起这样一枚装饰豪华的十字架^⑤。因此，从背面的图案上看，这枚金币也确实当属塞奥多西二世时期发行的索里得。

问题在于背面图案的一些细节与铭文。第一，关于这枚金币的报告称胜利女神背后“似有一星”。事实上，塞奥多西二世发行的拜占廷金币索里得当中，金币背面的胜利女神像有的没有星星，有的是在长柄十字架的右上方——十字架与女神头部之间有一颗星。因此，从这颗星的位置来判断，这枚金币并非塞奥多西二世时期官方发行的索里得。第二，报告称金币背面铭文读作 VICTORIAAVCC，它表示 victoria augusti，意为“全盛的皇帝们”。虽然塞奥多西二世发行的金币索里得当中也有采用这种背面铭文的例子，但是这一铭文并没有与胜利女神像同时使用。当时与胜利女神像同时出现的铭文格式为 VOT...MVLTV... + 铸币局号，其中铭文表示 vota...multa...，意为“已经取得了...年的成就，并为即将到来的...年祈愿”^⑥。1976年在我国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的塞奥多西二世金币索里得即属此类，背面的铭文读作 VOT XX MVLTV XXX，表明该币为420~430年之间发行。而上述两点则可证明陇西出土的此枚金币不属于塞奥多西二世时期发行的索里得。

那么，这枚金币究竟该如何判定呢？事实上，若大致浏览一下我国出土的拜占廷金币索里得的图案后，会发现其中相当数量的金币背面都采用这种“胜利女神+十字架+VICTORIAAVCC”模式，表明它在拜占廷帝国早期的金币中的使用相当普遍。从目前古币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种模式是在450年之后，也就是马西安皇帝（Marcian，450~457）统治时期首次采用，并成为6世纪以前帝国索里得背面的固定格式，一直到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统治中期，背面的图案才改为大天使的正面立像，而铭文则要继续使用到7世纪前半期^⑦。至此，从这枚金币的正背面形制铭文特征可以判断，它

应当是将塞奥多西二世金币的正面与 450 年以后的背面金币图案铸在一起的仿制品。

这枚仿制品与我国各地出土的各种单面、双面的金币仿制品差别很大。通常地说，我国发现的金币仿制品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诸如重量变化较大、币面模糊不清、制作粗糙、比例失调等等，而此枚仿制品无论在重量、直径、还是币面图案的精细程度方面，都与拜占廷帝国官方发行的金币索里得非常接近，显然这枚仿制品与我国发现的其它金币仿制品的仿制目的以及仿制技术不尽相同。

为了比较直观地呈现这两种仿制品的差异，笔者选取 1915 年 A·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张氏墓葬群中发掘的第 3 枚金币仿制品 (ast. i. 6. 03) 加以说明，与陇西出土的此枚金币仿制品形成对照。

此枚金币后来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该馆的网站上有此枚金币的清晰图片 (图二)，可以观察到其详细特征。从图片看：此仿制品为单面，背面仅为压刻正面图案时形成的痕迹。正面图案为皇帝 3/4 正面微向右侧胸像，头戴冠盔，身着铠甲，皇帝左侧有半边盾牌露出，盾牌上的图案应当是骑士刺落敌人图；在皇帝头部右侧还有矛头露出，而头部左侧似乎有两条飘带垂下；金币的左侧也就是皇帝右侧，隐约为皇帝右手攥拳，似握有一柄很细的棒；金币两侧似乎为铭文，但极其扭曲，难以识别，有的仿佛十字架图案，唯一可以辨认的是最后两个字母似乎为 CC。

这枚仿制品的显著特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图案总体上仿造拜占廷金币索里得正面的皇帝 3/4 微向右侧胸像，冠盔都有所表现，因此可以确定它是这类金币的仿制品。第二，在细节上，该仿制品与拜占廷官方发行的金币索里得存在明显不同。诸如：一、该枚金币图案中皇帝所戴头盔顶部没有翎羽。而拜占廷帝国早期使用的这种头盔是戎装的一部分，顶部饰有翎羽，以展示军人的英武。由于索里得上空间有限，翎羽一般都靠近金币正中顶部，恰恰将铭文分成左右两部分。显然此枚仿制品的制作者对拜占廷的头盔样式并不熟悉，故而将这一细节忽略，完全没有

翎羽痕迹。二、此枚金币的图案中皇帝所持矛头在耳部上方眼睛附近，然而右手所持之矛柄却用一根小小横线表示，而且角度偏移过大，甚至越过右肩，仿佛直指皇帝自己的脖子。三、此枚金币上皇帝身着之铠甲只用寥寥数笔勾出，而不是一般的索里得那样很细致地描绘，显然是该仿制者对铠甲形制的繁复不以为然，而只是拣其要点勾勒，足以展现其主要特点即可。

虽然在上面提到的细节上，仿制品的制作者没有完全符合金币原型的特征，但是在有些环节上还是可以看出仿制者在制作时极力模仿拜占廷金币的特点。比如：皇帝的盔甲、冠带和盾牌都以联珠纹来表示，尤其是盔甲边缘的珠纹比其它大一些；铠甲前面的三分图案以及盾牌的形状都与这种类型的索里得形制非常接近；还有盾牌上的纹饰，由于在索里得原型上的盾牌图案本不是很清楚，到 5 世纪晚期其图案更是发生变形，极为简略；而此枚仿制品能够根据原型上的图案将其描绘出来，尽管模糊不清，却已经与拜占廷索里得上的盾牌图案非常接近。

综合该枚仿制品在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可以推断出此枚金币的制作者很努力地复制原型的各种特征，但由于不熟悉拜占廷人的服饰特征以及国王戎装肖像的意义，最后制作出来的金币与拜占廷官方金币相差很多。这样的金币即使作为纯金制品适用于商品流通，却无法完全与拜占廷官方发行的金币索里得地位相当。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甘肃陇西发现的这枚金币仿制品，它在重量、成色、形制特征方面与官方发行的金币索里得极为接近，几可乱真，可以想象在有些地方这样的金币仿制品与真正的金



图二 1915 年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

币索里得的功能几乎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则是源于拜占廷金币本身的高纯度、高稳定性以及由此获得的良好声誉。当时索里得在拜占廷帝国周围世界中的地位可称为“中世纪的美元”^⑧。然而,由于金子的供应量有限,虽然帝国政府在各地设立许多铸币厂,但由于制作程序的束缚以及黄金数量的限制,铸造出来的金币数量非常有限,甚至帝国内部的需求也难以满足,更别说帝国以外的地区。于是拜占廷帝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为了满足自身对拜占廷索里得的需求,就仿制索里得的样式,发行金币,以满足自身的流通、财政或收藏需求。如此一来,因各地各国经济实力不一,铸造技术千差万别,造成有的地区铸造的仿制品非常差,有的地区制造出的仿制品其精美程度甚至超过拜占廷官方产品。例如西哥特王国铸造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索里得仿制品^⑨就相当精美,完全不逊拜占廷官方铸币厂的金币。尽管我国发现的索里得仿制品不太可能为西哥特王国仿制,但在拜占廷的东方,也有同样熟悉拜占廷索里得、拥有强盛经济实力和优秀技术工艺的国家,它们有能力铸造出优质的索里得仿制品。例如,1991年在约旦南部沙漠中的胡梅玛(Humeima),发现了5枚萨珊波斯仿制的阿卡狄乌斯索里得^⑩。

虽然仿制该币需要一定的条件,但由于这枚金币仿制品在中国出土,这里与拜占廷帝国相距甚远,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完全不可能寻找该币的仿制者。接着,我们来分析另外一个与此类似的索里得仿制品。

1966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墓出土一枚金币^⑪(图三),该币正面为皇帝3/4正面微向右侧胸像,头戴冠盔,盔顶饰有羽毛,脑后露出冠带;身着束腰外衣和胸甲,右手持矛,矛头从脑后露出;左手持盾,盾上纹饰应该是骑士持矛刺倒地敌人的图案,但是此枚金币图案中盾上画面并不清楚,似乎为一人像。正面铭文为DNAM(?)ASTAH SIVSPPAVC。背面图案为正面站立之天使像,其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左手托一顶上为十字架的球,球下方有一颗星;两侧的铭文为VICTORI-ΛAVCCCA,

底部铭文为COMOC。

与前文提及之塞奥多西二世索里得仿制品相同,若仅从铭文和正面形制看,这显然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然而这种正面站立天使像的背面样式最早却是在522年由查士丁一世首次发行^⑫,因此该金币是522年以后,根据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索里得正面与查士丁一世的背面样式,将两者合铸到一起的仿制品。

此外,这枚金币的样式还有一些细节和官方铸造的大多数索里得有些许差别。正面的铭文并不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索里得常用的DNANASTA-SIVSAVCCC,而将第二个N误刻成M;在左边铭文的最后多出一个H,这是阿纳斯塔修斯名字中没有的字母;和普通的索里得不同的是,此枚金币正面的铭文中间似乎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头盔装饰隔开,由于它极为模糊,几乎要连接在一起。背面底部的铭文COMOC也不同于普通的CONOB,尽管在5世纪的时候,COMOB曾经也出现过表示与CONOB同样的意义,但就此枚金币而言,显然M与C更可能是出于雕刻时的失误。

笔者曾经就此枚金币的形制求教拜占廷古币学家莫里森博士(Cécile Morrisson),她认同这是一枚“骡子”仿制品,其正面图案应是仿自头盔上饰以十字架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金币,这种类型的金币见于哈恩在《拜占廷帝国早期的钱币》第1卷。而且总体说来,她认为这枚仿制品“是相当忠实于其原型,并且制作相对比较精良”。

虽然此枚金币的仿制程度要逊于上文提及的塞奥多西二世的仿制品,但是从其做工来看,其仿制也是比较精心的,似乎要力求达到与拜占廷的索里得相仿的精美,然而仿制者对拜占廷帝国的语言以及索里得的一些惯用特征都不够清楚,



图三 1966年西安出土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仿制品(522年后)

在一些细节上的把握还不够，从而造成一些比较细小的失误。

截至2005年，我国境内出土、馆藏、私人收藏的拜占廷金币或金币仿制品已有近百余枚，但是由于认识不足，在对金币的鉴定上存有或多或少的偏差。本文所讨论的这两枚金币原先是被认定为拜占廷金币的，事实上，它们却是仿制品。

目前虽然我国境内发现的金币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仿制品，但是如何区分仍然是一个难题。以陕西这枚金币为例，我国学者康柳硕认为从“图像、铭文等制作来看，它可能是仿制品”^⑬。尽管他的推断正确，然而，事实上，仅从“制作”是无法确切地分辨仿制品，因为拜占廷的金币全部制作精良，有的可谓“制作粗糙，比例失调线条简单者，印铸深浅不一，铭文变形”^⑭。在实践中，区分一枚金币是官方铸造还是仿制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在拜占廷帝国内以及其影响力所覆盖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对拜占廷各种面值的钱币的仿制活动盛行，尤其一些地区的仿制品相当精美，给古币学家的辨别鉴定带来很大麻烦。只有通过发现地、发掘现场的各种信息，以及从其它铸币所得出的关于铸币的式样、雕刻风格等等因素，并结合历史记载从而得出是否为仿制品、是何种仿制品的结论。而涉及到我国发现的这些仿制品，因我国距离拜占廷非常遥远，各枚仿制品的制作千差万别，因此仿制者也有多种可能，难以得出确定结论。具体到这些相对仿真的仿制品，可以通过它们的一些特征，参考拜占廷古币学家对仿制品的研究成果，从而对金币做出更为精确的描述。

注 释

① Carson, R. A. G., *Coins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1990,

pp. 211 ~ 212.

② Whitting, P. D., *Byzantine Coins*, Barrie & Jenkins, 1973, pp. 106, 298.

③④ Kent, J. P.,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RIC)*, vol. X. *The Divided Empire and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Parts, AD 395 - 491*, London, 1994, pp. 73 ~ 74, p. 75.

⑤ P. Grierson & M. Mays, *Catalogue of Later Roman Coin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 from Arcadius and Honorius to the Accession of Anastasius*, Washington D. C., 1992, p. 142.

⑥ Vagi, D. L., *Coinage and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C. 82 B. C. - A. D. 480, vol. 2,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 59.

⑦ P. Grierson & M. Mays, *Catalogue of Later Roman Coin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 p. 158.

⑧ R. S. Lopez, "The Dollar of the Middle Ag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ii, No. 3, (Summer, 1951), pp. 209 ~ 234.

⑨ Grierson, *Byzantine Coins*, London, 1982, p. 355, Plate 15.

⑩ Erik de Bruijn; Dennine Dudley, "The Humeima Hoard: Byzantine and Sasanian Coins and Jewelry from Southern Jorda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99, No. 4 (Oct., 1995), p. 688, 697.

⑪ 王长启、高曼：《西安新发现的东罗马金币》，《文博》1991年1期。

⑫ Wolfgang Hahn, *Moneta Imperii Byzantini (MIB)*, Band I, von Anastasius I bis Justinianus I (491 ~ 565), Wien: 1973, Plate Justinus I/Gold. 不过贝林杰认为这种背面形制从519年开始，参见：Bellinger, Alfred R. & Grierson Philip, ed., *Catalogue of the Byzantine Coin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 Vol. 1, from Anastasius I to Maurice (491 ~ 602)*;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66, p. 36.

⑬ 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1年4期。

⑭ 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廷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3期。

(责任编辑 张海云)